

歷史與文化

慕拉士筆下的中國和澳門

何思靈*

Ex Oriente lux——來自東方的光

在歷史的是非爭論當中，這句子在總體上反映了十九世紀末期部份歐洲“知識界”的、急欲探索東方任何一塊土地的精神狀態。

鴉片戰爭後，歐洲的殖民主義到達了遠東，並帶來了我們的政治、經濟和軍隊。

因為管理上的需要，殖民地官僚從西方帶來了無數的人員，他們對這裏的有數千年歷史，與別不同的文化進行觀察、比較、稱頌又或者不接受。寄回祖國的管理報告、航程的觀感、有關她的習俗和風景的評述等在歐洲產生一股好奇和慾望的動力。

這些都是發生於一個危急和關鍵的時期，當時知識界認為西方已沒辦法有創見也沒辦法解決問題。西方是失落的，陷於衰落的天命以及虛無的純美主義之中。這樣，初昇的旭日更顯無瑕、活力及迷人。

東方的滲入在歐洲產生了兩個文化市場：一方面，是尋覓一個包攬東方哲學、藝術、文學及精神的觀念；另一方面，是使有關那個世界的信息普及，讓殖民者的資本主義從中得益。

*《行政》執行社長、澳門理工學院教師

從不同的社會及文化動機，兩個市場都推動了在東方植根和體驗生活的過程。

在歷史的無名的記載當中，慕拉士 (Wenceslau de Moraes) 是其中的一名在那裏植根的人。

在路過中國和在澳門生活過幾年之後，慕拉士自我放逐到日本，在那裏他全情投入生活，尋找幸福。

慕拉士何許人

在去世前的一年，即1928年他應一名日本人的要求編寫自傳：

“我是葡萄牙人，1854年5月30日生於里斯本（首都）。我修讀海事專業，後來做了海軍軍官，這使我有機會遊歷無數地方，足跡遍及非洲、亞洲、美洲的海岸。我在中國逗留過大約五年，期間曾乘坐砲艦到過日本的長崎、神戶及橫濱。在1893，1894，1895及1896年我曾經以澳門政府港務廳人員身份出差日本作短暫逗留。1896年我返回澳門停留了一段時間又再折返日本（神戶）。1899年葡萄牙政府任命我為領使，出駐兵庫（Hiogo）和大阪，直至1913年為止。那年，我感到身體不適，覺得自己無能力再擔任公職，便向葡萄牙政府請辭海軍及領使的職務，獲得批准後我退隱到德島市居住，那裏是我至今仍認為是休養生息的好地方。又，我在神戶和德島時，閒來寫了幾本關於日本人習俗的書，有幸地得到葡萄牙公眾的接受”。

雖然簡單謙樸，這篇自傳也提到了主要的東西：在澳門的居留，在神戶和大阪出任領使，在德島隱居，所寫的書。

對中國的第一印象

在外國人的眼裏，十九世紀的中國是可悲可歎的：在鴉片戰爭中落敗，被逼簽署1842年南京條約，對外開放商貿，被鴉片弄得昏沉欲睡，政府貪污腐敗以及內部四分五裂，太平天國的動亂搞得這巨人悽然倒下。雪上加霜的是，1894 / 95年在朝鮮半島的戰役中被日本擊敗。

這樣令到那個中國與慕拉士原先認識的中國大不相同，他這種認知受到十九世紀歐洲文化意識所影響。

對於那個中國，慕拉士道：*“唉！這個中國，四億的人口，無限的幅員，不辭勞苦的文化與工業，是一個慘被蹂躪的國家。中國人尊敬死者，而生人則在搶掠、屠殺中成長；不愛安逸，奴役自己。”*

在他們對美的感覺中，鄉村和城市並無兩樣。*“看他們所叫的中國鄉村，中國城市。在滿佈污水的地上有一列黑色的屋，潮濕，發霉的氣味中人欲嘔。”*

根據慕拉士所見，大自然氣象會集一起籠罩那荒涼的景象，瞬息萬變“時而冰封時而雲罩時而烈日當空，灼熱得就連狂風也不能使人涼快一下，永遠是一幅痛苦的畫象，荒涼崎嶇的海岸，污濁的河，致病的污水，被暴風破壞的叢林，集合一起，連無際的稻田，翠綠的稻田也沒光彩。”

在一篇關於農曆新年的紀錄中，談到因何中國人忘掉眼前一切，走到街上去慶祝：“對這群在我眼前的中國人，有什麼天大的悲澤令其多愁善感？（…）人群為無窮的苦難，昨天的，今天的和明天要面對的苦難祝禱；（…）每日無休止的勞動只為求得一把米；（…）還有近期纏繞著國家的災難：在南方省份，人口集中的地區發生了鼠疫（…）；禍不單行的是，被鄰國日本打敗，羞辱，讓世界嘲弄其國民，最終，面對貪婪的，毫不猶豫來加把腳的歐洲人已無力抵抗。”

當慕拉士首次去到日本時，感受是完全相反的。被迷惑著的慕拉士比較中日之行時道：“好像從一個大洞穴裏走出來進入了一個花園一般”。在他眼裏，這兩個地理上注定為鄰居的國家完全是遠遠分隔開的兩個世界。

“當我踏足這相同的海岸，我感到這是一個光明的國家，快樂的國家，一切那麼美麗，那麼和諧，令人激動（…）人群的生活充滿力量，精神煥發，抖擻於驚喜中；好像一件完美的物體，一個成熟的美果，直使人欲一口吞下。”

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他對大日本的激情與熱誠都是不變的。與相當正面評論日本的英人 Lafcadio Hearn 不同，Hearn 年青時曾熱愛日本，但這感情卻隨時日而消滅，慕拉士則對其選擇從一而終：“我認為…沒有日本太陽的熱則無需生存。”

對中國的另一印象

慕拉士大部份的書都是在日本的時候寫的，而且多年來他都有把文章寄到葡萄牙波爾圖商報上刊登，其後還結集成《日本來鴻》一書。

他寫的事物範圍極廣：由習俗至神話，人民到愛情，歷史，大自然，宗教以至日本古今文化都在他的作品中出現過。

他仍然繼續關心中國；中國文化與文明，中華人民的再生能力，民族之間的衝突，當然還有中日和日俄戰爭，他也沒有忘記葡萄牙和小小的澳門。

從這大量和精彩的題材之中，我們的感覺即時選擇了有關日本的大自然的篇章：“一個精心栽培的大自然，讓人類沐浴於愛和喜悅之中。”慕拉士愛上日本習俗之餘也愛上兩名日本女子，O-Yone 和 Ko-Haru。

這並非本文要談論的東西，本文是要談及慕拉士在十九世紀前後一段期間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研究以及其對葡政府在澳門的行政管理的關注，在英國進駐香港之後，比較不同的殖民架構模式是無可避免的。

但今天所表達關於中國的觀點與當時初期所寫的非常不同。

今天的是經過空間的過濾的看法，不再有與現實赤裸裸地對質的危險，慕拉士忘記那些使人煩惱的，只記著重要的來用作分析。

1905年，對於一份英國國會要限制其他國家人民進入聯合王國的電報，慕拉士有這樣的看法：“這個西方的做法只是針對東方。至於中國，由於中國指英國鴉片商人毒害其人民而將他們拒諸門外，英國向中國宣戰並佔據了香港；在五年前中國已表現不歡迎外人入境，指外人對其諸多羞辱，直接的排外例子便有發生於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導致所有國家聯手出兵中國，實行以武力教訓。”

慕拉士繼續說：“歐美列強直至今天都是使用極之專橫和高傲的手段，這部份解釋了這些人民都指証白種人不友善，是欺壓別人的民族。”

因此，慕拉士認為，1906年日本多次戰勝俄國是在數億中國人面前一挫白人的聲譽……“堂堂中國，有四億人口，長期處於劣勢受那橫蠻的白人欺壓，豈不羞恥？”

對於在中國某些地區不時發生屠殺傳教士的事，慕拉士認為這表示中國民眾對洋人十分憤怒，可能是民族情緒的另一次爆發，相似於義和團的動亂。

慕拉士強烈地相信一個完全獨立和考慮世界格局的復興精神正瀰漫整個中國，1911年他寫道：“中國抓緊現代的教訓，嘗試施行憲制政府，組織常規軍隊，制止英人帶來的逾半個世紀的鴉片毒害。”

慕拉士看到末代皇朝的終結並好奇地觀察著孫中山所建立的民國的來臨。慕拉士是一名改革的支持者，這可從他的作品中見到，可是他無法想象所見的中華民國的活力：令他吃驚的是新中國廢除了一些數百年的習慣，例如剪掉頭上的辮子。

“剪掉辮子。只是香港，中國的一塊很細小的地方，每日就有平均一百條辮子被剪掉（…）；丟掉旗袍，那絲做的美麗的旗袍也要丟掉；顯示階級的圓頂帽；宮廷禮儀，很多有趣的習俗和做法都一併丟掉……我則希望中國人在保留眾多東西和可以發展和進步之同時不需剪掉辮子和棄掉旗袍。”

在一片革命浪潮中的中國，關於她的將來，慕拉士肯定地說：“神秘，保守，由無限權威的天子所統治的中國已一去不返，已在新思維的火焰裏被燒掉了！……另一個出場了（…）卻是迷失於無邊際的思想意見當中的中國……”

慕拉士又以簡潔的方式預言西方世界“終有一日要與新中國競爭，或更確切的說，與新的亞洲競爭。”

慕拉士筆下的澳門

在《遠東的面貌》一書中，他經常提到澳門，在水上居住的貧苦大眾，可與騾馬相比的可憐的人力車伕，繫腳的習俗，“把腳弄小以給女人動人幽雅的姿態”販賣小童在這裏“無日無之”，福隆新街的熱鬧，翻攤檔、餐廳、旦家人及水手的生活，混血兒的苦況，痲瘋病者……

這些澳門的面貌的描述並沒有隱瞞到這個“葡國旗幟下的亞洲小城”所存在的真正問題。誰讀過《日本來鴻》定會察覺作者三個批評的話題：

——葡國人的低下水平的文化，這可從其對中華文化的無知中見到。

——葡人的差勁的行政管理與澳門相關的衰落。

——不相信其他歐洲國家殖民模式可作為發展澳門的另一選擇。

慕拉士說：在幾乎所有的葡國人的概念中，“經無數世紀孕育的”中華文化是“索然無味”的，然而，中國人的精神、優雅、講究禮貌、高尚精妙的幽默……使其性情以及文化的豐富表現生色不少……

我們的無知是多麼可悲和不可原諒！……

我們有關亞洲文化，尤其遠東文化的教育性文憲是多麼的缺乏；要向別人的充足的資料查詢是多麼令人反感！……

我們是歐洲人之中首先闖入中國的，對我們的傳教士所寫的著作感到滿足，但今天面對人種誌研究的新方法則感到不足，更何況那些著作是手抄本。對我們所接觸和部份我們管治的人民的的研究，尤其有澳門這絕佳的研究場所，我們做了些什麼……什麼都沒有！在研究與我們有關，來自葡人家庭，在這遙遠的站出現，今天在整個遠東代表著我們，叫作“土生”的天賦優缺時，我們做了些什麼，什麼都沒有！然而，數個世紀以來澳門是我們的一個輕率的研究場所，可憐的中國人給予一切，但我們並沒有一個起碼的系統的研究標準。當我們自問做了些什麼時，例如思想作品，參考文憲，大群到中國工作的人員，當醫生、長官、漢學家、教授等等，我們發現，有一次，一個作者寫了篇“葡國魂”；但沒有人幹了什麼……沒有什麼。

慕拉士分析葡人的行政能力時帶著一些怨懟的口氣，指責其在與同區域內的其他歐洲人作經濟上的競爭時欠缺進取。

慕拉士是一名細心但有時過度的觀察家，他毫不猶豫地指“葡萄牙並無以重要的商業設施和完善的港口來吸引本地人，那些或許是少數可以取悅他們的手段，他們都是卓越的商人，可利用稅項、專利、獨家等手段吸引他們。政府支持了惡習活動，鼓勵彩票、博彩、鴉片以及其他的行業。”

慕拉士建議解決的方法，認為澳門當局應提高其能力並要細心去接觸，盡力學習尊重華人居民，與鄰近的中國地方當局，北京政府以及日本政府加強彼此真誠的關係。

依慕拉士的觀點，這便是要“長期（因亞洲的全面解放為期尚遠）和安定地保留我們在這遠東的小小的土地的管治的做法。”

一份由英國駐北京使館商務人員所寫，部份轉載於神戶一份報章的有關澳門的報告的準確性令到慕拉士血氣翻騰。慕拉士寫道：“那份報告值得我們完全相信英國公務員的專業能力。在提及中國與東方國家之間的商業活動時，報告這樣開始：“除了澳門與中國之間的出入口運輸交通同時下降之外，所有其他東方國家的商貿都有顯著增長。”

慕拉士於是質疑：“為什麼會是澳門成為例外？當然了，我們這遠東殖民地的面積細小，港口不良兼且管理不善，沒有海陸通訊和面對鄰近地區港口的強烈競爭（只提了這幾個因素），都令人們欲憑藉精明商人的幹勁來光耀這古老葡國殖民地

的希望沒法成真。但仍應當懷有希望，至少澳門沿海的商業會不錯；清醒是殘酷的，若我們不懂得使澳門避免有一天淪落為海邊的一塊無用的大石的話那就是真正的可悲了。”

1909年在上海舉行了一次有關鴉片的討論會，葡萄牙自然有派代表參加。討論會的結論是：終止在華人間廣泛蔓延的惡習，“鴉片嚴重地損害了其經濟狀況，更壞的是慢性毒害這個民族。”

慕拉士以一個尖銳、諷刺的批評提醒人們：“在澳門，鴉片煙的製造是一項重要的專利，給澳門的庫房帶來大量的收入（……）。直至今日澳門從來不知以其自然資產（漁業、工業、內港商業、沿海及河的航運）來增加財富收入，慢慢令這些刺激澳門活力的動力消失：華人移居美國、彩票等等。跟著就是鴉片，其他的東西亦可消失去……”

慕拉士對英國人談論葡人行政效率的意見是特別敏感的，雖然他也承認我們的缺點，對英文報章把英人的效率與我們的古老殖民地的了無生氣作比較，指澳門昔日還是遠東的唯一的歐化城市的時候才重要時的侮辱和傲慢感到憤怒。

1908年香港日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 有一篇關於澳門的文章，提到她的傳統，今天仍存在的紀念碑以及她近日的衰落。可否阻止衰落呢？作者表示很懷疑；指出甚至一個選出來的新總督也不能令落後的澳門改善，並稱若要澳門重生，要麼將她交予比葡人更具進取心的人之手，要麼就是葡人本身先要重生。

“這樣很好（慕拉士說），比葡人更具進取心的人之手，在作者的心目中會是英人，德人，或法人的手（……）了吧，而我，依在下愚見，我會支持葡人自己重生，再而使其龐大的殖民統治重生。然而，當天命注定澳門的管治要易手，那麼就交回她原來的主人，即中國人的手；將印度交回印度人的手，將非洲交回非洲人的手，而永遠不會，不會交到我們這西方的鄰居的爪裏，避免公然侵害自然的和諧和避免我們丟臉，過去的已足夠了。”

最後，我們可說，歷史的判斷證明了慕拉士的所見。再不是傳說中的東方是今天地球上重要的一極，有能力競爭和輸出一切，包括科技。

但有條問題：東西方精神文明的相會能否塑做完整的人呢？

慕拉士欲以其與別不同的生活經驗，將兩者遙遠但互補的點結合一起以求得這一種相會。

他自願放逐到東方和日本德島，去尋找幸福和存在的意義足以證明他這種欲求。

Ex Oriente Lux.